

## 试论琉球官话课本的音系特点

陈 泽 平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州 350007)

**提要** 琉球官话课本是从 18 世纪中叶保存下来的珍贵手抄文献,从留在上面的一些关于读音的记号和附注,可以观察到当时的琉球学生所学的汉语官话的语音面貌。学者们对这个音系的属性看法分歧,有北方官话、南方官话或传统“正音”等不同意见。本文在濑户口教授工作的基础上,补充了新的资料,进行重新分析,指出这个音系是在福州方言的框架中纳入北方官话而形成的“福州的官话”。本文中一些分析也有助于对汉语近代语音史的认识。

**关键词** 琉球 官话 18 世纪 福州方言

### 壹

古琉球王国与中国明清两朝政府有良好的交往。洪武年间,明太祖遣闽人船工三十六姓移民琉球那霸久米町。也是从那时起,琉球国不断向南京、北京的国子监及福州的琉球馆派遣留学生。两国人员往来多半也都经由福州。在福州琉球馆学习的琉球留学生称为“勤学人”,他们学习语言、文化和各种生产技艺,再回国传授他人。当时学习汉语官话在琉球受到政府鼓励,蔚为风气。琉球民间使用过多种手抄的汉语课本。日本学者十分重视收集这样的汉语课本,并加以研究。

濑户口律子教授是研究琉球官话课本的专家,所著《琉球官话课本研究》一书,正如李新魁教授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引录了各种难得的资料,相当详尽地论述了琉球与中国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和睦邻关系以及派遣官生来华学习文化和语言等情况。作者还对《官话问答便语》、《学官话》和《百姓官话》等三种课本的内容做了相当详细的介绍和初步分析。

《官话问答便语》、《学官话》两书作者和年代都不可考。《百姓官话》从序文推测,可能是在乾隆十四年到十八年(1749—1753)之间编写的。本文将这三种教材合称为“琉球课本”。

这三种教材都只有问答形式的课文,用现在的说法即所谓“情景会话”,既没有 19 世纪西洋人编教材所用的语音描写或字母标音方法,也没有用中国传统的韵图或射标法等来说明音系。可以推想,当时的这种“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手段十分朴素,语音就靠师徒相授受,老师带着念课文,学生跟着摹仿罢了。

据日本学者六角恒广的介绍,直到明治三年(1870)日本外务省创办汉语学所培养汉语人才,使用的教学方法还是如此:“当时是既没有科学的方法也没有辞典和语法书的时代,除了完全把唐通事时代的東西照搬进汉语学所进行中国语教学外,没有其他道路。学生亦把教师的讲述作为唯一的依据,以其为基准反复进行练习、掌握,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教师的讲述,好也罢,坏也罢,都像口传的一样被尊重。”(六角恒广 1992:33)

这样学习一门外语当然是很困难的,特别是语音即发即逝,学生只能依赖传统的方法在课

本上做一些简单的标注来帮助记忆。琉球的官话教材上这样的标注有两类：

其一，课文上的每一个汉字都用发圈法标明调类，平上去入分别标在左下、左上、右上、右下四角，阴平阳平用圈号和点号区别，共有5个调。这个现象说明汉语的声调特性在教学中受到特别的重视。琉球学生学习汉语，声调既是重点，也是难点，这符合我们一般的经验。很明显，这些调号都是使用者后加的。

其二，有些字在书眉上用“直音法”注音，例如：庵音安、俭音见、餐音参、钳音乾、奠音店。有些同音字直接夹注在行间，紧挨着被注字。有的注一个同声韵不同调的字，再说明应读的调类，例如：盆音烹下平、坦音堂上声、鸳音元上平；但有时用不同调的字注音也不加说明，因为正文的每一个字已经都标上调号了。可以看出，一般规律是用比较常用的字来注不那么常用的字，显然是用已掌握的字来给生字注音。这些标注大约是先生在备课过程中记写的，或者是学生在听课时根据先生的发音记录的。既然当时还没有发明更好的注音工具，这是最方便的手段。这样注出的同音字在《官话问答便语》中最多，《学官话》次之，《百姓官话》中最少。

这些同音字的选择看来只是反映了中国人教师的口音，并没有任何权威工具书的依据。如果以《中原音韵》、《音韵阐微》或《新华字典》为标准来对照，其中很多同音字的选择是错的。用现在的话说，这个（或这些）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资质颇有问题，多有误人子弟之处。而他们的无心“失误”，却留给我们一个有趣的课题：当时的琉球人学说的中国官话究竟是什么样的？由于琉球的官话是从福州传过去的，是福州的先生教的。因此，研究这些课本，我们还可以探知，明清时期福州人说的官话是怎么回事。更进一步，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具体的例子约略估摸出当时东南方言区的官话使用的一般情况。

## 贰

很多学者都认为明清官话分为南北两派。大致说来，南方官话区别于北方官话之处主要是：第一，保留入声，有5个声调。第二，见系细音字的声母不颚化；或见系虽颚化，精组不颚化，构成尖团对立。第三，保留疑母，或者还有微母。一般认为，北京话是北方官话的代表，而南方官话的代表就是曾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话。这里所谓的“南方官话”仍是个地域方言的概念，大致等于今天的江淮官话区。明清两代也是官话方言上升为全国范围的共通语的主要时期。那么，在更远的南方，作为一种权威社会方言来接受的，究竟是北方官话还是南方官话呢？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通过剖析“琉球课本”，我们至少可以比较确切地了解“琉球官话”的真相。

六角恒广(1992)主要根据史料认为，在中国的明清时期，日本的“实用唐语”教学有两个中心。一个是长崎的“唐通事”。唐通事的工作是负责接待管理来自中国东南沿海以及南洋一带的商船，他们使用的唐语分别为“南京口”、“福州口”和“漳州口”。“口”即方言口语，所谓“南京口”指下江官话，是应用面最广的。另一个就是琉球王国的唐通事。“在琉球学习的是北京官话，或是‘以北京官话为中心’的北方官话，这一点与只限于与南方唐船进行贸易的长崎唐通事的唐语大不相同。”(六角恒广 1992:283)但六角氏没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这个判断做出论证说明。

濑户口(1994a)认为，“琉球课本”除了明显的闽语影响，主要反映了南方官话的特征。她的这个判断主要是根据声调特征做出的。课本中的标调反映出有5个调，平分阴阳，浊上归去，保留入声。把这个声调格局与现代汉语各重要方言的调类进行对比，作者发现只有代表江淮官话的南京方言相符合。李新魁先生在序言中表示赞同，认为这个结论“是相当有道理的”。

叶宝奎(2001)认为:“濼户口律子的分析是可信的,但她的结论还值得商榷。根据声调的分析,证明《百姓官话》音系不是当时的北京话,也不是北方方言的其它次方言,更不是吴、闽、粤、客家方言的音系,这是正确的。但是仅仅根据声调来证明《百姓官话》是根据南京话来写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作为琉球人学习汉语官话的课本,他所依据的应当是通行全国的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而不是一地方言。”(叶宝奎 2001:262-263)<sup>①</sup>

据叶宝奎(2001)详细的考察,明清时期的官话音应该指一种较为保守的读书音系统,也就是他所说的“通行全国的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叶先生说的这个读书音系统是以莎彝尊《正音咀华》、潘冯禧《正音通俗表》以及《罗马字官话新约全书》为代表的,与以北京音为代表的“北音”以及以南京音为代表的“南音”都有区别。

我们认为,这里所谓的“读书音”跟南方方言区中实际存在的“文读音”不同,其内涵应该是像“《切韵》音系”一样,只是“书面语音系统”的另一种说法。它只是理论上存在,并不诉诸唇吻,以南方方言为母语的人无法根据当时相当粗糙的语音学描述自己琢磨出该怎么发音。所以,即使当时的教学者心目中真有一个“正音”的观念,也未必能够付诸语言实践。方言区人士学官话,终究还是要靠对非南即北的现实语音系统的模仿。

我们还认为光靠调类特征来下判断是不可靠的。诚然,声调特征是判断一种地域方言系属的最重要指标之一,但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一种从古到今自然演进的地域方言,而是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共通语变体,不能不考虑母语方言对这个共通语变体的影响。“平分阴阳、浊上归去”是大多数官话方言以及南方方言的共同特征,从中不能得到什么定性的依据。至于入声调的存在,我们认为也不足以证明琉球官话是学了南京音或“标准音”。入声既是一种调类,也是一种韵类。喉塞韵尾的顽固存在使原入声字摆脱不掉短促的调值。吴闽客粤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难改入声短促的毛病,是大家在“推普”工作中共同的经验。这样的“普通话”实际上都多出了这个短促的入声调,而且不能认为是学了南京话或遵从传统正音观念的缘故。

### 叁

对“琉球课本”的音系下判断,更重要的是考察同音字组反映出来的声母韵母特征。这一方面,濼户口做了很多工作。同音字组并不直接显示音值,只能从中观察音类的分混。根据她的分析,“琉球课本”反映官话特征的主要有如下几点(濼户口 1994a:25-30。原分10条,今概括为7条):

1. 全浊声母消失,变与清声母同音。
2. 微、云、以、疑四纽相混,并混同于影纽。
3. 知章两组混同。
4. 在细音韵母之前,见系声母与知组章组已经合流。
5. 止摄蟹摄的三等韵并为一类。

---

<sup>①</sup> 叶先生的一个论据是《百姓官话》的作者籍贯山东,既不说北京话,也不说南京话;而且是知识分子,因而必然懂得要用标准音来教外国人。然而,《百姓官话》本是漂流到琉球的中国商人向琉球的唐通事提交的口语体报告书,内容是叙述自己滞留在琉球期间的经历,对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协助表示感谢,并没有编写课本的意图。乾隆十八年(1753)由琉球的“勤学人”将这个文本带到福州,经他的先生“闽县老儒林启升守超氏”校正,才被采用做课本的。文本固然是山东人的作品,教书的却是福州人,书上加注的读音记号自然也是依据这位闽县老儒的口音。

6. 三四等韵大面积合并。一些摄的一二等与三等合并。

7. 鱼虞韵合流。

从以上对声母韵母的特征分析上,看不出哪一点是属于南方官话而不是北方官话的。相反,见系细音字顎化,一般认为是北方官话的特点。推断“琉球课本”的见系细音字声母顎化的证据是如下一些同音字组(括号中是书中旁注的同音字):

警(整)、饥(知)、鞋(舌)、兮(诗)、治(记)、针(金)、朝(交)、占(见)、希(诗)、曦(诗)、绸(求)、降(胀)、险(善)

我们从“琉球课本”中发现同类的例子还有:

钳(缠)、闪(闲)、针(今)、禁(正)

这些同音字组的存在说明了见系细音字已经顎化到位,变成舌面音了。

濑户口(1994a)大概已经意识到对同音字组分析的结果尚不足支持她的结论,所以在强调声调特征对判断音系属性的重要性之后,又在“结语”中谨慎地提到“琉球课本”中的一些词汇语法现象:“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三种官话有反映‘南方地区官话’的可能,主要是从所使用的词语和一些语法特点着眼。并且,这三种课本所加的声调符号,表明其有入声的存在,这就使我们更加倾向于认为它们所表现的官话,可能是流行于广大南方地区的官话。”(濑户口 1994a: 86)但用词汇语法现象来区分南北官话体系是一项更加困难的工作。到目前为止,相关学科的研究水平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持。从她的举例中看,这些课本除了有一些可以认定的福州方言词语以外,并没有哪些词汇语法现象可以做为区分南北官话的鉴定标准。

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编的《唐话辞书类集》中有一本很特殊的长岐“唐通事”的工具书《粗幼略记》。原书是手写本,作者小寺玉晁,年代未详。据编者推测,可能是明和期间(1764 - 1771)的作品,也就是“琉球课本”同时期的文献。《粗幼略记》的内容主要是当时中日贸易的货物名称等。每条词目的左右两侧都用日文假名注音,该书开头处写有“右注南京音左注福州音”。从这些假名对音可以清楚看出,当时的南京话见系细音声母都用キ、匕注音,与精照系的细音チ、シ丝毫不混。略举数例如下(假名转写为日语罗马字):

锦绸 kin chiu 京青布 kin chin pu 交枝花 kiau chu hua 杭线 han shien 朽 hiu  
机巧 ki kiau 沉香 chin hian 鞞皮 shiau pi

南京浦口人胡垣的《古今中外音韵通例》作于光绪十二年(1886),比“琉球课本”和《粗幼略记》晚了一个世纪,仍然说“金陵读‘坚、沾、尖’分为喉齿牙三音”,依叶宝奎(2000:278 - 280)的考订,此时见系细音字的声母还没有顎化。直至更晚的劳乃宣《增订合声简字谱》(1905)才见到见系分出的顎化音而精组尚未顎化,尖团仍然有别。

既然南京话要到 20 世纪初才顎化,就不可能是“琉球课本”描写的对象。而闽语的见系细音字不顎化。所以“琉球课本”中的这种顎化音只能是从官话学来的。所谓“官话正音”的可能性也可以因此排除。可以推断,“琉球课本”学习摹仿的是演进更早的北方官话。

#### 肆

从“琉球课本”中的同音字组可以看到一些特点,这里指出与见系细音字有关的两点:

第一,前面所列说明见系细音顎化的同音字组用现代普通话读起来并不同音。这些同音字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与见系字同音的都是知组、章组的三等字,没有精组字,也没有庄组字。这样的分布格局说明,这些知章组三等字的韵母仍然带有[-i-]介音,尚未转化为开口呼,可见声母也还没有卷舌化,与庄组合流。因此可以推定,知章组的声母还是与舌面前音很相近

的舌叶音。见系细音字与知章组细音字互相注音只是因为它们十分相近,但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如果完全相同了,稍后知章组再离开见组、进入庄组就不可能了。当然,这只是被学习摹仿的官话音系的情况,在学习者这一方面,可能并没有舌面舌叶的区别。

第二,尽管见系细音字的声母已经腭化到位了,但与精组细音字仍判然有别。在全部三种教材中,除了上文的举例,我们另外还收集到见系细音字作为被注字共 37 例,其中 36 例以见系字注音;与此同时,精组细音字有 29 例,其中 28 例以精组字注音。可见“琉球课本”音系尖团音泾渭分明,唯一的例外分别是“欠(前去声)”、“簪(讲上平)”,应该可以看作是偶然的误读。以下罗列这些同音字组:

### 见系字

具(句)、忌(记)、效(孝)、歧(其)、骑(其)、寄(记)、祁(其)、器(气)、期(鸡)、车(拘)、驱(去平声)、健(见)、献(现)、姜(江)、刑(行)、钳(乾)、减(拣)、拊(乾)、遣(谦上声)、鉴(见)、姪(近)、牵(谦)、俭(见)、险(显)、咸(贤)、竞(近)、仅(景)、协(歇)、具(句)、减(间)、巾(今)、捡(见)、颈(今)、兼(间)、拣(减)、经(今)

### 精组字

捷(接)、萧(消)、鲜(先)、线(先去声)、煎(尖)、寝(进上声)、潜(前)、浸(静)、腥(心)、婶(醒)、井(进)、亲(井)、疾(集)、袭(习)、蓆(什)、迹(集)、积(集)、靖(进)、抢(详)、携(喜)、新(心)、唛(青)、星(心)、靖(进)、井(尽)、寂(集)、遂(岁)、碎(岁)

上述两点也许可以丰富我们对北方官话语音史的认识。李汝珍的《李氏音鉴》(1810 年)的成书时间比“琉球课本”晚了约半个世纪,他清楚地表明,当时的北音已经不能“香厢、姜将、羌枪”了。也许 18 世纪后半叶正是北京音系精组腭化、导致尖团合流的时期。

## 伍

从“琉球课本”的同音字组观察其语音特点,最突出之处其实并不在于它与北京音或是南京音相似,而是它与福州方言音系的血缘关系。濂户口(1994a:87)对此有很好的分析,她指出了以下几点:

1. 中古晓匣纽字与轻唇音相混。例如:

灰(非)、滑(法)、鞞(分)、互(付)、焚(红)、粪(混)、肥(回)、慌(方)

2. 齿头音声母与正齿音声母不分。例如:

斋(栽)、债(在)、舍(色去声)、稍(嫂)、祀(事)、嗣(士)、寸(春去声)、找(早)

3. 中古的日母字变读为零声母。例如:

乳(雨)、儒(予)、嚷(养)、演(染)、羸(仁)、样(襁)、软(远)、饶(摇)

4. 三种鼻音韵尾混而为一。例如:

零(林)、惭(藏)、腥(新)、鳧(忙)、贫(平)、尘(成)、坛(堂)、范(放)

5. 三种入声韵尾也没有分别。例如:

协(歇)、察(插)、积(集)、历(立)、折(则)、屋(物)、癖(匹)、寂(集)

从这些强烈的语音特征来看,“琉球课本”使用者实际上学到的只是一种“福州的官话”。这与琉球“勤学人”在福州的琉球馆学习官话的史实是吻合的。清代以来从琉球来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大多数是久米町的闽人舟工后裔。根据方言调查的经验,闽语方言岛在一个聚居的村落保持两三百年是十分正常的,这些从琉球来福州的“勤学人”很可能仍会说闽语。《百姓官话》所附的《林先生校正序》作者林守超自称“闽县老儒”。他在序言中谈到:“……天下言语,各

有不同,俱系土音,难以通行。惟有正音官话,所以通行天下。学习者唇喉齿舌,须当辨别清明,方得正音官话”,这只是泛泛而论。实际他自己所说的官话,我们已经从“琉球课本”的读音附注中看到了,就发音而言,学北方官话学得十分勉强,大体上就是在福州方言音系的基本框架里纳入了官话。在这个方柄圆枘的纳入过程中,福州方言中存在而官话没有的成分可以舍弃,如疑纽[ŋ-];而官话有、福州方言中不存在的音素却学不来,如日纽[z-/ʒ-]和轻唇音[f-]①。福州方言能分而官话不分的音类可以按对应规律合并,例如去声的阴阳两类;但官话中区分而福州方言不能区分的音类仍然相混,例如平翘舌声母和前后鼻韵母[-n]、[-ŋ]。“琉球课本”不能分卷平舌声母却能够清楚地区分尖团音声母,显然是因为后者存在可以利用的语音对应规律。除了这一点外,这个音系的声韵调系统跟当时的福州话韵书《戚林八音》十分接近:声母包括零声母共17个,多了一套舌面音[tɕ-, tɕh-, ɕ-],少了一个[ŋ-];韵母系统阴阳入三分,只有一种鼻音韵尾[-ŋ]和一种入声韵尾[-ʔ];两类去声调和两类入声调分别合并。

至于存在入声调的问题,我们同意叶宝奎(2001)的看法,承认传统的“正音”观念起了作用。尽管《等韵图经》、《李氏音鉴》都清楚表明北京音系中入声已经不存在了,由于区分平仄的需要,国语正音应该有入声的观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的“读音统一会”时期。南方人士肯定乐于接受这种观念并且毫无困难地付诸实践。

## 陆

作为社会共通语的“官话”是个模糊的概念,它是在统一帝国的行政系统运作和各地经济往来中自然出现的社会语言现象,也一直处在这种自然而不自觉的状态中,不像现在的普通话一样具有明确的内涵和法律地位。明清两朝是一个音韵蜂出的时代,各种大同小异的官话韵书并存于世,何为“正音”的讨论不绝于耳,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事实上并不存在明确的、实体意义上的标准音。耿振生(1992)、丁锋(1995)各自对反映明代官话音系的各种主要文献做了一个梳理,最终都得到相同的结论:“官话的核心部分是比较稳固的,是人们共同承认的官话成分;官话的非核心部分有些游移不定,可以因时、因地、因人的观念有些变化。……不规范性、游移性是近代官话语言有别于现代普通话的主要特点。”(耿振生 1992:121-122)南方方言区的一般人士学说官话只是为了应付交际需要,并不刻意寻求标准音。京城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基础方言有更大的影响,自然而然地成为摹仿的对象;而摹仿的结果必然是糅进各地方音的特点,产生出种种范围更加广泛的官话变体。不管语言学家如何看待这些变体,它们不同于作为母语的当地方言,可以与外地人大致沟通,老百姓就认为是“官话”。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明清时期,福州人学说的官话是对北方官话的模仿。这与永乐十八年(1420)明成祖迁都以后,北京稳定地作为两朝首都的历史事实相符。由于历史文化条件的限制,当时福州人学习官话在语音方面难以摆脱方言母语的强烈影响,画鹤不成而类鹜,也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音系特征。体现在“琉球课本”附注上的音系从整体上讲,既不是南京音,也不是北京音,更不是“通行全国的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它仅仅属于“福州的官话”。

① 参考前文所述知章组的情况,推断日纽字很可能仍有[-i-]介音,因此发音部位可能也在舌叶或舌面上,容易与喻纽等相混,变成零声母。福州方言没有轻唇音,非敷奉的文读音都并入晓匣。

## 主要参考文献

- 长泽规矩也 1970 《唐话辞书类集》, (东京)古典研究会, 汲古书院
- 丁 锋 1995 《琉球汉对音与明代官话音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丁 锋 1998 《球雅集》, (东京)好文出版
- 傅 力 1991 元明清三代的“推普”工作, 《语文建设》第 9 期
- 耿振生 1992 《明清等韵学通论》, (北京)语文出版社
- 黄绍武 1919 《闽音正读表》, (上海)宏文阁
- 濑户口律子 1994a 《琉球官话课本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 濑户口律子 1994b 《百姓官话全译》, (东京)明治书院
- 濑户口律子、左藤晴彦 1997 《琉球官话课本语汇索引》, (东京)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
- 黎新第 1995 明清时期的南方系官话方言及其语音特点, 《重庆师院学报》第 4 期
- 六角恒广 1992 《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王顺洪译),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鲁国尧 1985 明代官话及基础方言问题, 《南京大学学报》第 4 期
- 徐恭生 1987 琉球国在华留学生,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 4 期
- 叶宝奎 2001 《明清官话音系》, 厦门大学出版社
- 张升余 1998 《日本唐音与明清官话研究》, (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Review of the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Ryukyu Mandarin Textbooks*

Chen Zeping

**Abstract** *Ryukyu Mandarin Textbooks* is a rare hand-written literature record preserved since the mid-eighteenth century. From the marks and notes concerning pronunciation left on the pages, we can estimate the phon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Mandarin then, which the Ryukyu students learned. On the issue of categorizing this specific phonological system, scholars have come to different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work by Prof. Setokuchi Ritsuko, this article brings in new reference data and provides reanalysis. It concludes the phonology formed by fitting Northern Mandarin into the framework of the Fuzhou dialect. Some points in this article might also enrich our cognition of the phonological evolution of Beijing Mandarin.

**Key words** Ryukyu, Mandarin, eighteenth century, Fuzhou dialect